

# 民族志与翻译:翻译研究的人类学视野

段峰<sup>1</sup>,刘汇明<sup>2</sup>

(1.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2. 四川师范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传递和再现他族文化是民族志和翻译的共同目的;同时,民族志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手段,在对文化的阐释、“撰写”及翻译作为一种“改写”中,表现出显著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民族志和翻译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相互阐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话语。

**关键词:**民族志;翻译研究;写文化;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5-(2006)01-0091-05

根茨勒(Gentzler)说,翻译研究只有采取全球化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才能对翻译和翻译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更加全面的了解[1]。在翻译研究中,翻译理论同相关学科的理论相互借鉴和交流,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后的主要特征,也是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翻译理论同其它相关理论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空间,形成了翻译研究的多重视野。同时,翻译研究也为其它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将从人类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民族志和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喻义的相似性进行讨论,并提出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研究的文化理论的相互阐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话语。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以文字形式形成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他族文化的一种写作方式。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对他族文化的阐释。前者对经验、记录和观察进行阐释,后者对已经存在的文本进行阐释。民族志学者通过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方法,对他族文

化进行理解、研究、记录,介绍给本族同胞;译者则是通过阅读和理解源语文本,将源语文本中所表现的异族文化传达给译语文化[2](180页)。民族志和翻译都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转换,将他族语言的语码转换成本族语言的语码,但这仅仅是两者语言学意义上的生成形式。民族志和翻译的根本性质和最终目的是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是两者能够相互阐发的基础。民族志学者和译者都具有相同的对象——他族文化,在对他族文化的阐释和再现中,他们又都面临着语言的、文化的种种选择。他们即受制于一定的规范,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

在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的撰写是文化表述的重要方式。民族志学者对待他族文化、再现文化他者的立场和方法对整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志的跨文化特性决定民族志实践就是一个对他族文化阐释性的描述过程,或称翻译的过程。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把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任务描述为“文化翻译”;林哈特(Lienhardt)提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翻译,认为民族志意义上的翻译跟“转化”、“教化”同义,也与改变、交流

收稿日期:2005-03-27

作者简介:段峰(1962—),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人类语言学、翻译理论。

刘汇明(1972—),女,四川雅安人,四川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理论。

的意义相近;利奇(Leach)提出,他所从事的学科的“根本问题是翻译问题”,并得出“社会人类学家从事的是创立文化语言翻译的方法学”的结论[3](16-17页)。民族志随着人类学的产生而产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西方对“遥远、奇异”的土著文化的描述,以民族志的形式将异族风貌呈现给他们的同胞。西方民族志经典常常是以客观真实地再现他族文化的面貌出现,在人们有关他族文化的阅读中构筑起传统民族志的权威和对西方视角的服从,使西方传统民族志的撰写过程成为表现西方人的我族中心的过程。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他族的思想和文化殖民化过程中,民族志通过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共谋的作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并不是中立的,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有其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指向,当所有的语言符号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社会的话语流,集中反映这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美学品位和错综复杂的权利关系。民族志学者作为他族文化的“读者和作者”,在对他族文化的理解阐释中,他的“前理解”视野中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充满了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民族志撰写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马文字所谓优越性的迷恋。西方人对于书面语的崇拜直接导致他们对于他族语言,尤其是非字母语言和口语的轻视,进而发展到对由这种语言所表现的文化的蔑视。16世纪欧洲人在对南美洲的殖民主义过程中,十分惊讶地发现土著人没有“字母”,于是,他们把土著人称为“野蛮人”[4]。这种的字眼强化了他们头脑中有关欧洲人是“文明人”的想法。西方人对书面语优越性的迷恋源于他们哲学思想中对两元对立中逻各斯主义的迷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基于生物进化模式的假设。书面语被认为是欧洲文化发达的标志。德里达曾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巴西的南比夸拉人(Nambikwara)没有书写的观点提出批评,说他的观点是建立在普遍的或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认识上的,这种错误观点认为书写专指欧洲语言的表音和线性符号;因为在南比夸拉人语言中没有西方人概念中的书写形式,所以西方人便否认南比夸拉人已经拥有了广义上的书写这一事实。德里达认为非字母符号同样具有书写的尊严[5](67页)。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通过语义的二元对分,将一切非西方的东西他

者化,并以此建立和强化西方人的优越感。在此影响下,传统民族志中的翻译就等同于教化,成为单向的流动,并由此阻断了在民族志撰写中,以文化交流为特点的翻译之路。

20世纪初,以鲍厄斯(Boas)为代表的人类学批评派或历史派崛起,他们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方的我族中心主义,使文化间的交流和再现成为可能。鲍厄斯在长期的人类学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相对于另外一种文化而存在的,是本民族文化持有人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相互交往的结果。对他族文化的描写和表现并不简单是将他族的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转换成本族的语言,而且还是一种对他族文化的了解、阐释、决定的过程。文化相对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认为这种异质性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并呼吁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敬和交流。文化相对论当时对人类学研究的直接贡献就是:文化翻译作为民族志的任务被正式提出。为了客观真实地再现他族文化,民族志特别强调调查方法的使用,如参与观察法。研究者通过较长时间生活在所研究的民族中,在体验、观察和访谈的基础上撰写翔实的民族志资料来表现他族文化。民族志借用派克(Pike)的两个概念“etic”和“emic”来表示文化客位和文化主位,以区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文化客位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文化主位则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民族志学者应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他族文化,以局内人的视角来描述他族文化。之后,格尔兹(Geertz)提出文化研究是一种阐释行为的理论。他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阐释科学”[6](5页)。按照他的阐释人类学理论,民族志撰写是一种再阐释,是在所研究文化中的文化持有者对本族文化阐释基础上的再阐释,是阐释之阐释,其目的是去发现文化表象之下的文化意义的构建规律。格尔兹的理论强调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阐释能力,指出文化意义并不存在于文化的表象中,客观再现他族文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志学者只有在种种文化表象之下,通过分析和阐释,寻找文化意义的构建规律,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描述所研究的文化。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人类学的文

化理论和在民族志的具体实践,从视他族文化为“无”到承认其“有”,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在殖民主义文化观的控制下,无论是鲍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它们都未摆脱寻找文化本原意义的西方逻各斯意义理论的桎梏,他们的理论还是坚持在西方人能客观全面再现他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结果,带来的是在民族志文本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家独语,其表述方式充满了对他族文化的不尊重或蔑视。民族志中的翻译成为一个西方权利独自漫步的空间,他族文化通过被翻译,被他者化,而越来越被边缘化。

尼南贾纳(Niranjana)在谈到人类学和翻译研究的渊源关系时说道,美国人是在人类学研究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背景之下开展翻译理论的,而英国人则是为了配合殖民统治之需[5](78页)。这里有一个问题,谈到西方翻译理论,人们通常认为开始于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Cicero),他首先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而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1860年代,同泰勒(Tylor)的积极倡导密切相关。翻译理论的出现远远早于人类学的出现,怎么可以说翻译理论是在人类学研究背景下开展的呢?以当代文化研究的翻译观来考察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便是在具有共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欧洲各国、各文化和各语言之间展开的,虽然他们对翻译的本质、翻译方法进行过争论,但在他们之间的文化翻译中,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更多的是语言层面上的翻译。但当西方人开始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开始对非西方文化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对他国实施殖民统治,作为重要方式之一的翻译活动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翻译研究就具有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传统翻译研究和作为文化研究的翻译研究的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这种区别导致不同的理论话语的形成。如忠实于原著、忠实传达作者意图等翻译主张,许多学者已经从当代语言学理论、读者反映理论、阐释学理论及文本理论等方面证明了其不可能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结合从民族志中的翻译研究得到的启发,我们可以把忠实于原著等翻译看作是同样源于对西方书写语言(写成的源语文本)的敬畏,并由此而形成的对原作者的崇敬和对源语文本意义权威性的服从。

西方翻译史中曾出现过6次大的高潮,如开始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由于相信古希腊文化优于自己,尽管当时古希腊已成衰退之势,古罗马还是对古希腊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翻译。罗马文学的伟大作家安得罗尼柯(Andronicus)、涅维乌斯(Naevius)和恩尼乌斯(Ennius),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Plautus)、泰伦斯(Terence),都用拉丁文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从中世纪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便是向当时建立各自封建国家的“蛮族”传播基督教精神,翻译《圣经》的宗教翻译活动成为这一阶段的特征。这一段时间的翻译标准,自然就是围绕着如何忠实地传达上帝的福音来展开的[7](4页)。综观西方翻译史和非西方国家的翻译历史和现实,可以有两点发现。一是西方翻译实践更多的是在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传统的欧洲各文化之间进行的。由于是在欧洲人书写语言之间的翻译和改编,欧洲人对西方翻译史中自西塞罗以来便一直争论的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等问题的容异度要大得多,主要是在美学或语言学层面的讨论。二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翻译交流活动中,西方国家的文本,如文学作品,作为经典被大量地译介进非西方文化中。这种单向的文化输入的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原因自不用说,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共同构建的世界里,反思我们的翻译活动,并进一步地思考由翻译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无疑是有好处的。在西方人的翻译实践中,一旦对他族文化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们就不再讲究忠实与否,我族中心主义思想暴露无遗。菲兹杰拉德(Fitzgerald)在翻译《鲁拜集》(Rubaiyat)时,曾这样写道:“这些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实在很开心。他们够不上诗人的水平,难以叫人不对他们恣意改写,他们也确实需要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8](1页)同民族志一样,在翻译中,文化他者并不是被直言说的,而是翻译者刻意过滤和安排的,就西方人而言,翻译是将一切非西方化的东西他者化的手段。巴斯内特(Bassnett)在评价奈达(Nida)的文化翻译实践时说道:“西方翻译理论在文化转向之前,一直沿着诸如奈达等圣经翻译者的文化工作这条线发展。奈达有关文化翻译的理论都来自于人类学,他辉煌的



翻译工作具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通过翻译基督教文本,将非基督教徒教化为基督教徒。奈达的一部名为《风俗与文化》的著作,就是以‘基督教使命的人类学’为副标题的,此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优秀的圣徒从来就是优秀的人类学家’[9](129页)。巴斯内特显然拒绝将奈达的文化同文化研究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两种文化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奈达的文化是殖民主义的,而巴斯内特的文化是后殖民主义的。就翻译而言,奈达的文化指的是源语文化,他的文化翻译观要求译者将源语文化也就是《圣经》文化详细准确贴切地译介进译入语文化中。巴斯内特的文化则是译入语的文化,翻译研究要研究的是翻译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译者的翻译活动怎样受到译入语文化中的种种因素的限制等等,如勒费弗尔(Lefevere)概括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

1986年,克林富德(Clifford)和马库斯(Marcus)编辑的《写文化》出版,标志着人类学思潮中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对民族志撰写中的经典范本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民族志作为一种写作,其修辞方法的重要性。写文化将人类学研究同文学创作隐喻性地结合起来,文化不是表现或再现出来的,而是以文学或半文学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是“写”出来的。写作是一种修辞手段,同作者的志趣爱好、思维能力、价值取向相关,也同写作时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等密不可分[10]。写文化之争直接质问传统经典的民族志著作的权威性,对这些著作“客观全面地”反映他族文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拷问在这种权威性和客观全面性之下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写文化之争使人们加深了对文化描述的建构及人为性质的理解,削弱了民族志的权威模式,使人们认识到“跨文化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权利不平等的世界,由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了西方学者在文化表述中缺乏对被研究者应有的尊重。族性、权力、对抗、制度化约束等文本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民族志构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1](528页)。

在几年后的1992年,勒费弗尔和巴斯奈特在他们编著的一本名为《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的论文集中,也提出了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e)的观点。他们在书中正式宣称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巴斯奈特认为,

文化转向的文化并不接续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而是同文化研究汇流,将文化研究的理论,如后殖民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女性主义等引入翻译研究的语境中,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开展翻译研究。勒费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强调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学创作。在文学翻译中,由于时间的变迁,语言的畸变,意义的消隐和文化的差异,文本的原意难以企及,或者按解构主义的观点,根本就没有一个原意。相反,译本是在译入语文化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操纵”和“改写”的结果。翻译研究应将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东西都纳入其研究范围,将一切影响翻译任务的决定、翻译者的委托人、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翻译文本的出版和发行等因素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在多语共生的多元文化系统中,翻译就是一个文化的建构过程。当代翻译研究区别于传统翻译的最大特点便是解放了被遮蔽的翻译者,将研究从以源语文化为取向转向以译语文化为取向,并以翻译的权力关系和文本的生产为研究目的。因为同民族志撰写一样,族性、权力、对抗、制度化约束在文学翻译文本的构成中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尼南贾纳有一段精辟的话,可以看作是对民族志和翻译研究新的发展的评注:“意义的传统理论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符号能毫无问题地再现现实,使现实‘在场’。但将符号看作是反映或再现就是否认了巴特所说的‘语言的生产性质’和德里达谈到的‘写作’。新一代的民族志学者从后结构文学理论中得到启发,强调写作对‘民族志学者所从事的工作的中心作用’,语言不是透明的媒介,民族志学者‘发明’了文化,而不是再现了文化。他们认为文化翻译的作品使用了文学的程序,这些文学过程不光影响了民族志的写作,也影响了民族志的阅读。揭示文化翻译的建构性性质表明翻译总是‘生产’而不仅仅是反映或模仿一个‘本原’。”[12](81页)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民族志和翻译具有长久的渊源关系,翻译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在人类学的背景下发展的,文化传通和再现他族文化是民族志和翻译聚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所在。文化研究将权利、霸权等术语作为分析工具,将民族志和翻译视为殖民主义的一种文化手段,认为它们在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建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民族志理论和翻译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互阐发性,当代人类学

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研究都将文学的因素结合起来,强调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段。民族志的“写文化”和翻译研究的“改写”都具有主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特征。民族志理论和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通过梳理西方我族中心主义在民族志文本和翻译文本中的建立,及在后殖民时期被解构、消解的过程,能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开阔的层面上来理解翻译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对于我国翻译理论界,运用操纵意识形态等文化工具,重新审视西方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情况,例如20世纪中叶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

介情况,无疑对于我们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也为翻译研究增加了新的理论话语。翻译文本的生产就是一种文化生产,这包括两种不同语码的转换,本身就包含文化意象的传递、失落和变形。同时,翻译作为一个个案,体现更大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关系调适,交融或者冲突。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传通。在当今这样一个互动共构的全球文化中,文化差异性是我们开拓自己的文化资源、参与到多元文化对话中去的平台。翻译,自巴比塔之后,无疑是这种对话的最可能方式。

### 参考文献:

- [1] Edwin Gentzler.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外国语, 2005, (4).
- [2] Michaela Wolf. *Culture as Translation-and Beyond Ethnographic Models of Repres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 Hermans,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 [3] 西奥·赫曼斯. 翻译的再现[A]. 谢天振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Carmen Valerro-Garces. *Modes of Translating Cultures: Ethnography And Translation*. *Meta*, 1995, XL(4).
- [5] Te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6] 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7]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8]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hanghai: SFLE Press, 2001.
- [9]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FLE Press, 2001.
- [10] James Clifford & George E. Marcu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11]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Ethnography and Translatio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UAN Feng, LIU Hui-m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 lot in common. They share a common goal of representing cultures of other peo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w prominent features of subjectivity, historicity and sociality in interpreting and “writing” culture and in translation being “rewrit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thnograph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studies; writing cultures; cultural turn

[责任编辑:张思武]